

天命中国：建设者领导世界

China's Mandate of Heaven: When the Builder Leads the World

“那些杀不死我的，终将使我更强大。”

——尼采《偶像的黄昏》

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

必先苦其心志，

劳其筋骨，

饿其体肤，

空乏其身，

行拂乱其所为，

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

——《孟子·告子下》

引言：历史的回摆

当今世界最宏大的叙事，莫过于中国崛起。这不仅是经济版图的重绘，更是人类历史的剧烈回摆。

面对这一变局，西方主流学界习惯于将其解读为对现有霸权的威胁，或是某种异质文明的回归。然而，这些解释都过于表面。它们仅仅看到了力量的消长，却忽视了更深层的逻辑：**这不仅是谁来领导世界的问题，更是用什么逻辑来领导世界的问题。**

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五千年的历史长河，就会发现，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并非始于当下，而是源于文明最初的设定：

面对一片如此丰饶而又潜藏危险的辽阔大地，中国文明该如何生存？

一、文明原点：律法之山与建设之山

在人类文明的源头，矗立着两座隐喻性的山峰，它们分别定义了西方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生存逻辑与治理基因。

一座是西奈山。先知摩西在雷电中独自登山，面对神意。他带下山的不是面包，而是两块刻着十诫的石板，因为神已赐下食物：旷野中的吗哪和鹌鹑。面对混乱的以色列各支派，摩西确立秩序的方式是**“律法”**：确立人与神的契约，并由此衍生人与人的契约。这一刻，隐喻了西方文明“保守”的生存逻辑：**秩序来自天降律法，完美的秩序在于保守一套永恒的规则。**它关注权利的界定，预设了神恩之下的温室花园，其核心任务是通过政治论辩、法律博弈来切分蛋糕。在当代西方，这种逻辑最终演化为“律师治国”的迷之自信。

另一座是涂山。大禹在此会盟诸侯，但到达这里之前，他已经在泥泞中跋涉了十三年：面对滔天的洪水，他没有像摩西那样，逃去旷野等待神赐的食物，而是拿起了铲子和测绳。大禹确立秩序的方式是**“建设”**：疏通河道，削平山川，将肆虐的洪水纳入江河，从而划定九州。这一刻，隐喻了中国文明“变革”的生存逻辑：**秩序来自建设实践，有效的秩序在于驯服不断变化的环境。**它关注问题的解决，预设了洪水肆虐的生存试炼，其核心任务是如何通过改造自然、重塑山河来做大蛋糕。在当代中国，这种逻辑最终体现为“工程师治国”的发展奇迹。

在过去的几百年里，西方兴起让世界相信：维护既定权利的“保守逻辑”才是正道；而今天，中国用崛起证明：在实践中自我革新的“变革逻辑”更具力量。

二、 美国神学：拿“运气”当“能力”

中国崛起的叙事，长期由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所主导。其核心论调正如弗朗西斯·福山所宣称的“历史终结”：西方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形式。我们不妨称之为“美国神学”。

这套神学是“天降律法”的现代回响：繁荣是上帝对“坚守信仰”的奖赏，“因信称义”，只要照搬英美的“市场经济”和“宪政民主”这套神圣律法，繁荣就会自动降临。

不幸的是，这套神学犯了一个根本性的归因错误：它将自然的恩赐，描绘为制度的优胜，将特殊的际遇，神化为普世的真理。

傲慢之罪使它自认真理在握，敢拿西方制度这一把尺子，去丈量全世界的历史。

在美国神学的滤镜下，数千年中国历史被抹黑成了“专制、停滞”的黑暗历程，仿佛这片土地上从未有过文明的辉煌，人民从未创造过值得骄傲的成就。

更可笑的是，这套叙事要把中国历史切开来看：它选择性地肯定后四十年，认为那是“向西方制度靠拢”的结果；却不愿意，也没能力讲述一个完整的、连贯的中国故事。

这不仅贬低了中国，更误导了南方国家。唯有超越这种神学，看清“温室花园”与“生存试炼”的区别，我们才能读懂“中国道路”的真意——**这绝非温室花园里的顺水推舟，而是在生存试炼中逆天改命的英雄史诗。**对于同样‘身处试炼’的南方国家而言，这更是一份打破宿命的启示录。”

三、 历史的底色：人与自然的博弈

人类历史，归根结底是人类应对自然挑战、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故事。

在这个故事中，不同的自然环境，设定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与发展道路，也由此塑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。

中国文明，是一个以“大禹治水”为源头和象征的伟大叙事。这片土地并不贫瘠匮乏，相反，它拥有北半球最广阔的温带与亚热带沃土，以及最丰富的水热资源，凭借这份天赋的丰饶，中国在漫长的农业时代创造了璀璨的文明，承载了全球最多的人口，其经济总量曾在两千年中长期居于世界之巅。然而，这种优越的天赋伴随着危险的试炼——不稳定的季风气候。在世界文明史上，很少有哪个文明像中国这样，不得不将人与自然的斗争提升到如此核心的位置。黄河、淮河的治理，都江堰、郑国渠的修建，京杭大运河的开凿——这些工程奇迹背后，是农业文明在东亚大陆上的极限适应，是一个民族与水旱灾害进行的持续搏斗。

这种搏斗塑造了中国文明“**实事求是**”的基因：面对无情的自然法则，任何空谈和教条都无济于事，唯有通过大规模的组织 and 动员，才能在洪荒中求得生存。在这里，生存不是理所当然的权利，而是战胜危机的结果。

然而，巨大的自然风险和随之而来的生存压力，虽然在农业时代激发了中国文明改造世界的潜能，却也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高墙，挡住了它自发走向工业化的道路。

因此，当工业革命降临，农业文明的辉煌转眼间变得脆弱不堪。一个看天吃饭的农业国，在武装到牙齿的工业国面前注定溃败，这就是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本质。

近代以来关于中国“专制、停滞”的指责，往往忽略了这一点：问题不在于它有什么根本性的文化缺陷，而在于“看天吃饭”给它带来的巨大挑战。

四、 市场的物理学：工业化背后的农业稳定

工业化不会凭空发生，它需要严格的经济社会条件。除了极少数“中彩票”的国家，这些条件并非天然具备。其中最关键的，是“**有效市场**”的形成。

不像美国神学鼓吹的那样，只要照搬“宪政民主”，挂起“市场经济”的招牌，“有效市场”就会自动出现。它的前提是**极低的市场风险**。经济学家们常常抽象地谈论“市场风险”，但很少追问：风险从何而来？答案就是：**粮食和能源**。

作为经济链条最上游的基石，粮食和能源的供应，直接决定了整个市场的稳定性。

我们谈论的不仅是物资短缺，更是价格的剧烈波动。乾隆皇帝有一句话：“天下无不食米之人，米价既长，凡物价、夫工之类，莫不准此递加。”意思是说，米价是百价之基，一旦米价上涨，所有商品和人工的价格都会跟着涨。这揭示了一个被现代经济学忽略的传导机制：

当粮食价格剧烈波动时，整个价格体系就会乱套。

丰年谷贱伤农，灾年米贵害民。粮价波动的影响力会经由物价、工价等一系列价格信号快速传导至整个市场：企业无法预期成本与收益，就不敢扩大再生产；劳动者无法预期工资购买力，就不敢脱离土地成为产业工人；资本为了避险，就宁愿囤积居奇也不愿投入回本慢的技术研发和产业投资。

更深层的障碍在于资产难以稳定估价。在生存预期极不稳定的社会里，土地等资产缺乏一个保值的底线。比如丰年时大家争相买地，地价虚高；灾年时为了换一口救命粮，千金良田也会被贱卖。这种价格震荡使得资产交易变成了赌博，买卖双方都无法看清未来，交易很难谈，即便谈成了也往往有悔约纠纷，使得交易过程变得极为复杂，资源配置的成本极高。

归根结底，粮食和能源是市场的定海神针。只有它们稳了，市场上的万物才有定价的基准。

只有当价格信号不再传递着生存恐慌，人们才能放心交易，才能配置资源，才能细化分工，“有效市场”才能真正形成并支撑起现代工业体系。

毕竟，当生存预期不稳定时，所有的规划都会指向‘避险’，而不是‘发展’。

五、 温室花园：低风险农业与西方的兴起

究其根源，是工业革命为西方兴起提供了压倒性的物质力量。孕育了这场工业革命的英格兰是“有效市场”自发形成的特例，但这不是什么文化、制度的必然结果，而是人类历史上寥寥无几的“中彩票”：它来自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，无法普遍复制。

1. 自然彩票：运气爆棚的英格兰

英格兰拥有温和湿润的海洋性气候，受北大西洋暖流和西风带影响，降水全年分布均匀，没有明显的旱涝季节变化，极端天气极少。与中国没有定数的季风气候形成鲜明对比，英格兰的粮食产出可以相当准确地预估，英格兰人不担心“今年丰收明年绝收”这种事。

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。正是这种粮食产出的稳定性，使得英格兰赢得了先机。在这里，人们关心的只是划好地界，写好租约。地里总能长出粮食，一分耕耘必有一份收获，并不需要为之忧虑。

2. 长期定额地租：幸运的奢侈品

在深受季风或大陆性气候影响的广阔地区，粮食产出忽高忽低、如同赌博般难以预料，如果采用定额地租，地租收低了，地主要喝西北风，收高了，农民会“久赌必输”。因此，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”的**分成地租**才是这里的普遍制度。

而英格兰长期以来粮食产出都相当稳定，地主和农民有信心用最简单的“一口价”、“五十年不变”来说定粮食分配的规矩，这就是所谓的**长期定额地租制**。根据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考证，自中世纪甚至更早时期开始，“永久或近于永久的农地租约”就已在英格兰普及。这并非英国人比其他人更有“契约精神”，而是“自然彩票”赐予他们采用这种简单办法的奢侈权利。

“信心比黄金更宝贵”，长期定额地租制不仅仅是让农民和地主双方省心省力，更对整个英格兰社会的运转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。

3. 经营方式演化：租地农场的兴起

在长期定额地租制的基础上，英格兰演化出了**租地农场**这种经营方式。租地农场主作为经营者，一方面向地主租入土地、支付定额地租，另一方面雇佣农工、支付定额工资，收获的粮食由他独立出售，扣除地租和工资，剩下的都是他独立所有的盈利。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，正是**现代企业的先驱**——它与现代企业“定额利息支付给银行、定额工资支付给工人、独享剩余利润”的典型模式完全同构。

作为现代企业的前身，这种租地农场比个体农户规模大很多，规模大有利于它们采用新技术，提高生产力，但也放大了风险：微小的价格波动，都可能导致巨大的盈亏反转。幸运的是，英格兰稳定的粮食产出，在支持定额地租之外，还熨平了物价和工资的波动，使得这种经营方式有机会持续盈利，于是租地农场就逐渐发展壮大起来。

4. 社会秩序：斯密财富三要素的统一根源

粮食产出的稳定性，还带来了更深远的社会后果。亚当·斯密提出了财富增长的三个要素：“和平、便利的税收，以及过得去的司法（peace, easy taxes,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）。”

一直以来，这被视为一套高深的“制度配方”。但其实，这只是“自然彩票”在三个方面的自然投影：

- 和平：**不单指没打仗，更指社会内部的低冲突。只要确信未来一直有饭吃，人就不想现在去拼命。正是粮食稳产带来的安全感降低了人们的生存焦虑，消除了剧烈的生存博弈，和平自然降临。
- 便利的税收：**和平生活下，政府不需要很多税收来养很多兵，人民也有稳定的收入来纳税。另外，粮食稳产，市场价格波动就小，税收是多少就变得容易计算。这就避免了围绕“滥税”与“抗税”的缠斗。
- 过得去的司法：**这一点最常被误读。英格兰之所以实行叠床架屋、松散杂乱的普通法体系，是因为它的社会冲突烈度低，司法任务本来就不重。正如温暖的天气里不需要厚重的冬衣，一个家家都有余粮的社会也不需要精密高效的司法。相比之下，那些粮食不能稳产的地方，生存环境更为严酷，社会冲突高发，政府必须强有力地维持秩序，这就迫使它们采用更为严密高效的成文法体系。

与其说英国拥有“优越的法治”，不如说它拥有“不需要强力法治”的幸运。斯密所描述的并不是一套普世的制度设计，而是一个温室环境下的自然状况。

5. 综合效果：有效市场的水到渠成

在工业革命之前，英格兰还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农业革命。17-18 世纪，四轮作制（小麦-芜菁-大麦-三叶草）的推广消除了休耕、提高了产量，畜牧改良使牲畜与种植有机结合、改善了土壤肥力，圈地运动则整合了零散的土地，确立了规模化经营，为新技术的推广扫清了障碍。这场农业革命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，释放了大量劳动力。

在劳动力准备就绪的同时，“自然彩票”还让英格兰拥有了更多条件：一方面，当欧洲大陆陷入无休止的战乱时，海峡天险让英格兰独享了长期的地缘安全；另一方面，英格兰任何地方距海不超过 120 公里，海岸线曲折，伦敦、利物浦、布里斯托尔等天然良港众多，运河建设又将工业区与港口连为一体，运输成本极低。煤炭储量丰富且约克郡、兰开夏、纽卡斯尔等煤矿靠近港口和主要工业区，为蒸汽机的发明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
至此，工业革命三大要素齐备：粮食稳定充裕让劳动力敢于离开土地，能源充足为机器提供了廉价动力，交通便利让商品实现了低成本流通。当这三者叠加，市场风险与生产成本被降至最低，“有效市场”水到渠成，资本敢于从短期的投机套利转向长期的产业投资，工业化自然发生。

6. 英格兰的镜像：美国北方

美国北方的条件与母国英格兰同样优越。

新英格兰和纽约、宾夕法尼亚等中部殖民地属于温带湿润气候，受大西洋影响，降水稳定均匀，没有季风气候的剧烈波动。宾夕法尼亚土地肥沃，被称为“美国的面包篮”，小麦产量丰富，粮食价格稳定，农民收入可预期。波士顿、纽约、费城、巴尔的摩等优良港口星罗棋布，哈德逊河、特拉华河等内河可通航，1825 年伊利运河开通后更将大西洋与五大湖连为一体，运输成本大幅下降。新英格兰虽然缺乏煤炭，但河流众多、落差大，水力资源丰富，马萨诸塞州洛厄尔成为著名的水力纺织工业中心；而距离不远的宾夕法尼亚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，通过运河可便捷运往沿海各州，为从水力向蒸汽动力的转型提供了能源基础。

粮食稳定充裕、能源兼备、水运便利——美国北方不仅完美复制了英格兰的工业化条件，更以其广阔的腹地成为了一个“放大版”的英格兰，“有效市场”自发形成，工业化自然展开。

7. 制度优越论：温室花朵的傲慢

西方兴起的本质是“中彩票”。但是，后世的理论家们却选择性地无视了这一点。他们宣称，

只要模仿西方制度，搞搞多党选举、私有化、市场化，繁荣就会自动降临。他们否认了世界的复杂性，把“中彩票”的西方模式普世化，这无异于一种廉价成功学：它无视了自然的恩赐，傲慢地将运气包装成了能力。

六、 殖民掠夺：助力而非动力

关于西方的兴起，长期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误读：右翼的“美国神学”将其归结为西方制度的胜利，把运气包装成了能力；而左翼的“依附理论”则将其归结为殖民掠夺的结果，把罪恶夸大成了动力。

依附理论认为，西方之所以富强，是因为通过殖民掠夺积累了原始资本，从而实现了工业化。这种理论虽然揭示了殖民主义的罪恶，但却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——将外部掠夺的‘助力’误读为了内部发展的‘动力’。

历史证明：掠夺不是现代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原因。

1. 西班牙：黄金漏斗的教训

最有力的反例是西班牙。它是最早的“日不落”殖民帝国，从 1492 年开始持续 300 年，从美洲掠夺了数量惊人的金银。按照“掠夺富强论”，西班牙理应成为最强大的现代工业国。但结果恰恰相反：西班牙成为了著名的“黄金漏斗”。

为什么？因为西班牙本土受地中海气候制约，无法提供稳定充裕的粮食供应，市场风险大，导致工商业非常脆弱。因此，海外掠夺来的巨额财富，并没有在本土转化为资本投入再生产，而是被用于购买外国商品、维持庞大军队和奢侈消费。

这些黄金如流水般流过西班牙，迅速流向了荷兰、英国和法国——那些拥有稳定农业和繁荣工商业的国家。最终，坐拥金山的西班牙不仅没能工业化，反而因严重的通货膨胀快速衰落为二流国家。

2. 英国：不仅有爪牙，更有肠胃

与西班牙相反，英国早期掠夺较少，但凭借本土粮食产出的稳定性，发展出了包括纺织、造船、金融在内的繁荣工商业。

当英国后来开始向外掠夺时，抢来的每一分钱都能投进本土的产业循环中：投资工厂、改良技术、扩大贸易。英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成为世界霸主，这种财富增殖能力才是关键：它具备了消化和利用财富的“肠胃”，而不仅仅是拥有了抢夺财富的“爪牙”。

3. 工业化：动力在内不在外

西方的兴起，殖民掠夺无疑是巨大的“助力”，但绝非“动力”。

真正的“动力”源于本土粮食产出稳定带来的工商业优势。包括英格兰、荷兰、比利时和巴黎盆地在内的英吉利海峡两岸，加上大洋对岸美国的新英格兰和中部各州，它们有着类似的粮食产出稳定性，孕育了有效市场和工业革命，这里才是西方力量的根本源泉。有了它们，西方才有了在军事和商业上掠夺全球的能力。

刻意将西方兴起简化为殖民掠夺的结果，虽然在道德上占据了高地，却在逻辑上陷入了误区。这种“归因于外”的思维掩盖了工业文明真正的门槛。

至此，我们可以对西方兴起做一个彻底的澄清：事实证明，无论是右翼吹捧的“制度神学”，还是左翼执着的“依附理论”，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。归根结底，西方的兴起建立在“中彩票”的运气之上。

温室里的花朵，经不起试炼场上的烈日严霜。南方国家和中国一样身处“生存试炼”，缺少这张“自然彩票”，盲目复制西方制度这样的“温室花朵”去求发展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

幸运的是，中国走出了新路。

七、 生存试炼：高风险挑战与内卷化社会

中国文明面对的，不止是得天独厚的丰饶，更是季风气候带来的试炼。在这里，划好的地界，写好的租约，都抵挡不住来自洪水与干旱的致命一击。

1. 难以维系的分工

我们从一首上古歌谣说起，相传这是舜巡视河东盐池所作：

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

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

这首《南风歌》道出了东南季风所带来的丰饶：“南风之时”带来充沛的降雨和高热，是农业、盐业丰收的最佳条件，这使得中国这块土地拥有了令人惊叹的高产和财富，然而，这种丰饶的背后又潜藏着巨大的危险：南风’什么时候来、带多少雨和热，没个准数。一旦“南风不时”，丰饶就会变成灾难，从三皇五帝到新中国建立这五千年来，“看天吃饭”这一挑战从未改变。它不只是生存威胁，还是分工障碍，我们就以盐业为例来说明。

盐池周围土地盐分较多，不适合耕种。假如盐池周围的晒盐人专职晒盐，去和远处专职耕种的人交换粮食，那么双方都能专心做事，生产效率高，最终双方都受益，这就是分工的好处。但现实中，这种分工却难以维系。

对于那些专职晒盐的人，“看天吃饭”让他们面临一个“两头堵”：

季风是难以捉摸的，“南风之时”，风调雨顺，晒盐收入可以买到足够粮食；“南风不时”，粮食歉收，种粮的人只能少卖粮食，于是粮价暴涨，晒盐的人会发现自己买不起粮；同时，大家都要花大价钱买粮，于是没有余钱买盐，晒盐的人会发现自己卖不出盐。这就让晒盐的人“两头堵”：买不起高价粮，卖不掉手中盐。这种危险让他不敢专职晒盐，必须自己种点地保命。

历史上，由于盐是重要税源，政府往往设立专门的盐户，强迫他们专职晒盐。但这种由官府主导的分工同样是脆弱的：一旦粮价暴涨，盐户或依赖官府救济，或逃亡求生，历史记载中有很多有盐户生计艰难、纷纷逃散的记录。

对于那些专职耕种的人，“看天吃饭”也让他们面临另一个“两头堵”：

丰年时粮食多但价格低，卖不出好价；灾年时价格高但是粮食少，也卖不出多少钱甚至没得卖。所以他也总是穷，耕种之外还得做点副业，才能买上其他用品或者是补充粮食。

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一切行业，不仅做工的不敢专职做工，耕种的也不能专职耕种。

这种分工障碍就导致了所谓的“内卷化”现象：**农民既耕种又做手工，家庭所有成员都要劳动，时间很长，强度很大，极度勤劳却仍然极度贫困。**

这种“内卷化”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，凡是粮食产出不稳定的地方都能看到，比如恩格斯就讲过德国的类似情形：“土地不让这些人去另谋生计，但同时又不能供给他们足够的生活资料。这个阶级也是极端贫困的。”

2. 为什么规模化、机械化经营无法建立？

人们常将“内卷化”简单归因为“人口过剩”，或者说“人多地少”。但这只是表象。如果多余的人口能进入工厂，那就是“人口红利”而非内卷化。

“内卷化”的本质，不是人口过剩，而是分工停滞。为了确保灾年有一口饭吃，劳动力只能分散在农户中“男耕女织”，无法建立规模化经营，更无法过渡到机械化大生产。

以中国传统棉布业为例，鸦片战争前其总产量高达 3.1 亿匹，看似规模宏大，但这并非大生产的成果：它们由无数个家庭小作坊生产，并随即消融在自给自足或邻里交换的微循环中。为什么在这个最大的非农行业里，迟迟没有诞生大规模的织布工场？

根本原因在于粮食产出不稳定扼杀了规模扩张和资本积累的可能。

首先，市场需求极不稳定。在看天吃饭的环境下，消费者的购买力完全取决于粮食的收成。丰年尚能消费，灾年连饭都吃不饱，对布匹的需求会急速下跌。这种剧烈的需求震荡，使得任何试图扩大产能的工场主都注定要面临产品积压、资金链断裂的灭顶之灾。

其次，存不下钱，更不敢借钱。规模化生产需要稳定的资金链，而机械化更需要高昂的初始投资。但是，同样是因为这个看天吃饭的环境，小生产者赚的一点钱往往在灾年为了买粮保命而被花光，根本没钱扩大再生产。借贷市场也因为市场风险太高而只剩下了高利贷。谨慎的经营者不敢扩大规模，更不敢冒险购入昂贵的机器，因为无法预知能否支撑，更无法预知何时能收回本钱；而那些敢赌一把的鲁莽经营者，则很快会被市场风险淘汰。

结果就是，分工被市场风险锁死。亚当·斯密曾指出“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”，在这里，“范围”不仅仅指地理上的大小，更指时间上的连续。一个动荡不安的市场，养不活专业的工人和复杂的工序。当大家都不敢脱离土地专职做工时，高效率的流水线分工就无从谈起。

于是，在粮食产出不稳定带来的试炼中，人们只能选择最保守的策略：既耕种又纺织，什么都做，但做什么都不赚钱，只有拼命增加劳动时间来换取微薄的生活资料。这就是“勤劳革命”却无法引发“工业革命”的根本原因。

3. 加剧人口压力的“正反馈”

粮食产出的不稳定，还通过双重机制推动了人口极限增长，加剧了人地矛盾。

第一重机制是“走不了”。正如前文所述，剧烈的粮价波动让农民不敢彻底脱离土地。一旦离开，灾年就可能买不起粮。因此，无论人口怎么增长，大家都只能死死地守住土地来保命，这导致有限土地上的人口过于密集，所有人都生计艰难。

第二重机制是“还得生”。既然有限土地上的人口过于密集，生计艰难，为什么还要生？因为在粮食产出不稳定的社会里，社会冲突也高，最根本的生存保障就是血缘家庭。通过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，人多力量大，既能互相救济，也能团结御敌。这就引发了对早生多生、人口增殖的追求。“多子多福”不是凭空的文化迷信，而是高风险环境下的理性选择。

这两重机制一叠加，就变成了一个逃不掉的“正反馈”：为了抗风险，一方面人被锁死在土地上走不出去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拼命生孩子。结果人地比越来越高，人均产出越来越低，风险反而越来越大。相比之下，英格兰和美国北方因为粮食产出稳定，社会冲突也低，人们不需要依靠大家族，也敢于离开土地，这就导致生育率较低，人地比不高，反过来推动了农业进步，强化了粮食产出的充裕和稳定，为走向工业化创造了条件。

4. 适者生存：大纺车的失传

粮食产出不稳定的地方，小农经济成为工业革命的障碍是普遍现象。然而，也会有催生出先进机械的特殊时期。

比如元代中国就出现了效率惊人的水转大纺车，它用于纺麻，拥有 32 枚锭子，靠巨大水轮驱动，机械构造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。但到了明代，一方面棉花推广，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压力加剧，劳动力变得比机器更便宜。既然雇人比买机器划算，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自然变得无利可图。

大纺车虽然先进，但因为需求消失，技术迭代就断了，没能进化出适合棉纺织的新版本。大纺车的遭遇，是中国古代无数先进技术的缩影——它们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，最终都消失在“人多地少”的历史长河中。

没有稳定的粮食产出，就没有稳定市场需求，再先进机械也无法点燃工业革命的火种。只有粮食产出的风险降到最低，且长期稳固，才能形成“有效市场”，进而推动工业革命。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偏偏发生在英国，而没有发生在人口更密集、煤铁水力等各种资源并不比英国更缺乏的广阔地区。

如果按照自由放任的市场逻辑，在“看天吃饭”的环境下，根本无法形成支撑工业化的“有效市场”。面对这道困死无数传统文明的难题，迷信西方的“制度药方”是无效的。必须有人像大禹一样，站出来挖运河、修水库、改造物理世界。

这就是中国道路的必然指向：**通过“有为政府”的主动作为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，重塑生存底座，系统性降低市场风险，人为创造出“有效市场”。**

八、 伟大的奠基：为神州大地装上“减震器”

在理解前三十年的意义之前，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革命究竟为了什么？

从清末到民国，人多地少的传统农业走向崩溃，西方冲击又破坏了固有秩序，饥荒频发、流民遍地、军阀混战，外敌入侵，中国社会混乱到了极限。在这种“天下大乱”的高风险环境下，市场机制处于瘫痪状态，工业化成果只能说是聊胜于无。

革命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选择，更是生存秩序的重建。革命的成功，不在于夺取政权，而在于建立了一个能够**维系生存秩序的强大组织**。

中国要走向工业化，必须先革了‘看天吃饭’的命。只有彻底克服悬在头顶的粮食风险，工业化才能放开手脚全面推进。这是当代的‘大禹治水’，是再造中华的不世伟业。

从这个视角重新审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：这不是一段“违背比较优势的弯路”，而是一个**系统性地降低市场风险、创造“有效市场”的奠基过程**。

1. 计划体制：市场风险的“防波堤”

建国之初，中国在实质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家。长期战乱之后，粮食产出虽有恢复，但受制于传统农业，人均粮食产量徘徊在 300 公斤上下，且极不稳定。

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下，中国引入了计划体制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征程。

经常有人以“短缺经济”来批评计划体制，短缺固然存在，但是这种批评倒置了因果：**不是计划体制导致了短缺，而是短缺导致了必须实行计划体制**。

我们不应忘记，在计划体制建立之前，中国何曾有过不短缺的时候？那时的短缺，是经常性的饥荒，是毛泽东所痛陈的：“现在我们能造什么？能造桌子椅子，能造茶碗茶壶，能种粮食，还能磨成面粉，还能造纸，但是，一辆汽车、一架飞机、一辆坦克、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”。

然而，想要搞建设，首先要过一道硬坎：钱从哪里来？或者更本质地说，钱的信用从哪里来？

钱之所以值钱，根本上不是因为它背后有黄金或美元，而是因为能买到东西——尤其是能买到填饱肚子的粮食、穿在身上的衣服，也就是古典经济学所谓的“工资品”（Wage Goods）。这就是经济学的铁律：粮食够吃，钱才稳得住。正如陈云所言：“钞票发多少，要看物资有多少，主要是粮食和棉布。”

在看天吃饭的环境下，粮食剩余有限而且脆弱，自由放任的市场逻辑只会导致粮价飞涨、投机盛行和秩序崩溃。**计划体制的实质，是在大市场无法有效运作的情况下，国家以有限的粮食剩余为货币锚，创造一个隔绝风险的“小市场”**。在这个由国家信誉担保的避风港里，重工业、国防工业和科研部门得以在与外部动荡隔绝的环境中，进行长周期的技术迭代和资本积累。

计划体制像一道防波堤，挡住了市场风险，保住了工业化的火种，维系了最初的社会化大生产。

2. 农业革命：五千年未有之转折

在前三十年，中国完成了一场针对物理世界的深度改造，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：对抗生存威胁。

* 基础建设的系统推进

五十年代初，以苏联援建的 156 项工程为核心，中国初步构建了涵盖冶金、能源、化工、机械与军工的完整工业体系。与此同时，基础设施与资源勘探也取得突破：成昆铁路穿越禁区，大庆油田打破“贫油”论断。加上六十年代在原子武器上的突破，既保障了和平发展，也降低了国防费用。这些在当时看来也许“不经济”的投资，实际上是在为整个国家的全面工业化构建骨架，铺设血管。

* 农业革命的隐秘战场

最为关键却常被忽视的，是发生在农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。在季风气候下，要实现稳产高产，必须进行一场“反自然”的彻底改造。通过推广“水、肥、药、种”四大要素，中国实现了一场静悄悄的农业革命：

* **水利：**新中国一成立，就展开了战天斗地的治水斗争。从治理淮河到根治海河，从红旗渠到数不清的小水库。到七十年代末，全国建成了 **8 万多座水库**（占今天总数的 90% 以上），数百万公里灌溉渠道纵横交错。这些水库不仅是蓄水的容器，更是**粮食波动的减震器**——旱能灌，涝能排，把“看天吃饭”变成了“旱涝保收”，系统性地降低了季风气候对农业的冲击。

* **化肥：**五十年代末起步，七十年代通过“四三计划”引进 13 套大型化肥设备，中国化肥工业从无到有，规模持续扩大。1980 年化肥施用量约 1270 万吨，到 1990 年已超过 2500 万吨。化肥的普及，意味着中国农业突破了自然束缚：正是以大庆为代表的石油天然气工业，提供了关键原料，支撑起现代化工体系，将深埋地下的油气资源转化为土地急需的氮素。**工业的成就，化作了滋养农业的养分**，这对粮食高产意义重大。

* **农药：**从五十年代起步，到七十年代末，中国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农药工业体系。农药的普及有效遏制了病虫害的肆虐，据估计可挽回 15%-30% 的粮食损失。这不仅意味着总产量的提升，更对稳产贡献显著。

* **良种：**良种培育在七十年代迎来突破：1973 年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，抗病高产的小麦品种也相继问世。良种增强了作物对抗病虫害和适应环境的能力，使粮食更加高产稳产。

这场农业革命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。

前三十年，伴随着人口几乎翻倍（从 5.4 亿到近 10 亿），人均粮食产量长期稳定在 300 公斤上下——在人口爆炸的同时维持人均产量不降，这本身就是巨大成就。八十年代初，七十年代开建的大型化肥设备集中投产，高产良种全面推广，粮食稳产与高产两翼齐飞，人均粮食产量不再徘徊，而是节节攀升。

3. 奠基的意义：通往“有效市场”的桥梁

当粮食供应趋于稳定、充裕，一条从物理基础到有效市场的道路终于打通：

粮食供应趋于稳定、充裕，构成了坚实的货币锚，使得市场上的商品、劳动、资产价格可以预期，市场风险降低。一方面，政府征税和资本投入有了清晰的依据，大量工厂得以开办；另一方面，摆脱了“从手到口”的生存束缚，”数亿农民得以离开土地进入工厂。最终引爆了以乡镇企业为先导、波澜壮阔的全面工业化。

前三十年不是弯路。它是“**有为政府创造有效市场**”的决定性开端。正如大厦不能建在沙滩上，如果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生存底座，后四十年的“市场经济”大厦根本无从建起。

九、 创造大市场：从物理奠基到全面工业化

当基础条件具备后，后四十年的全面工业化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。这不仅是市场的胜利，更是建设的胜利。这是一个关于发展的伟大故事，但它的序章写在前三十年。

1. 冲破枷锁，分工爆发

前三十年的艰苦建设，终于在八十年代初汇聚成一股洪流，冲破了历史的枷锁。

首先是粮食风险的解除。 当化肥和良种普及，农业稳产高产成为常态，困扰中国数千年的魔咒终于被打破。吃饭问题有底，国家终于打开了严控人口流动的闸门。数亿农民得以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转身加入产业大军。

其次是基础设施的积累。 铁路、公路网络不断延伸，支撑了大规模物流，逐步覆盖全国的坚强电网，提供了远超一般国家的能源稳定性。密如蛛网的交通网络和超级稳定的电力供应，让‘有效市场’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持续运转，原本分散、孤立的区域市场，向着统一大市场持续整合。

于是，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分工爆发：数亿农民不再像祖辈那样困守一亩三分地，而是走进工厂，专职从事某一道工序。纺织厂里飞转的纱锭，电子厂里流动的传送带，每个人都只做一件事，生产效率飞跃式提高。当年亚当·斯密在制针厂里看到的“效率革命”，在中国大地上千倍万倍地复制。

中国之所以能成为“世界工厂”并最终进化为“全球制造中心”，根本原因不是廉价劳动力，而是实现了深度分工——这才是中国力量的真正来源。这种极致的分工体系，确立了中国制造的双重优势：和工业体系还不完备的南方国家相比，中国拥有难以复制的产业链深度；和受制于规模瓶颈和能源短板的西方国家相比，中国拥有无可撼动的超大规模与能源优势。最终，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强大，使得中国制造在效率和规模上都达到了人类工业史的巅峰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并未止步于已有的工业化成就。依托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全产业链优势，

中国率先引爆了新能源革命，正在为“有效市场”注入更强大的动力。

如果说农业革命解决了“人的粮食”问题，那么新能源革命正在解决“机器的粮食”问题。核能、光伏、风电与储能技术的突破，意味着能源供给将变得前所未有的廉价、稳定且无处不在。这将进一步降低有效市场的运行成本，彻底熨平外部能源价格波动甚至是供应中断带来的风险。

这是一个完美的正反馈：“有效市场”推动了全面工业化，全面工业化创造了新能源技术，而新能源技术反过来进一步夯实了“有效市场”的物理根基，推动中国走向下一轮更加宏大的工业革命。

2. 深化林毅夫理论：有为政府创造有效市场

针对中国道路的解释，林毅夫教授提出了“有为政府”和“有效市场”这对概念——政府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引导，市场负责配置资源，两者结合就能成功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观察，但结合历史实践，我们还可以挖掘出更深层的因果链条。

对于后发国家来说，“有效市场”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只要挂起“市场经济”的招牌、搞搞私有化和价格放开，它就会自动长出来的。俄罗斯当年的“休克疗法”就是血淋淋的教训。“有效市场”的基础，是极低的市场风险，其根本则是粮食和能源的供应要充裕、稳定，而这有赖于艰苦的基础建设来创造。

因此，中国道路的深层解释是：“有为政府”创造了“有效市场”。

同样是林毅夫等学者的观点，认为前三十年走了“弯路”：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，优先发展烧钱的重工业，导致轻工业没跟上，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。这被视为“违背比较优势”的历史教训。

但如果我们跳出单纯的“产业效率”视角，从“粮食风险”的维度重新审视，就会发现前三十年的另一重意义。

我们要问：为什么当时中国一定要“违背比较优势”去搞重工业？除了国防需求外，一个被经济学家常常忽略的原因是：**所谓的“劳动力比较优势”在当时其实是一个被锁死的“伪命题”。**

在粮食短缺且不稳定的高风险年代，庞大的劳动力被锁定在土地上以求糊口，根本无法转化为产业大军。要解锁这庞大的劳动力，农业就必须稳产高产；而农业要稳产高产，就必须用重工业的产品去“改造”物理世界：

如果没有钢铁和水泥工业，就无法修建数万座水库和配套的灌溉渠道；

如果没有机械制造业，就无法生产合成氨所需的高压设备，化肥工业就无从谈起；

如果没有化学工业，农药就无法普及；

如果没有电力工业和电机制造，覆盖农村的电力排灌网就无法建成。正是这张网，在旱涝灾

害面前守住了粮食的底线。

前三十年看似“违背比较优势”的重工业优先战略，实则是基于经济规律的必然选择：它为传统农业注入工业化的硬核力量，通过改造物理环境，解决了粮食危机，从而稳定价格体系，只有做到了这一步，“有效市场”才得以形成，劳动力才能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，比较优势才真正成为了现实。

这就是中国道路的根本所在：不是“有为政府”和“有效市场”的二元共治，而是“有为政府”创造“有效市场”——先通过国家力量的重点投资改造物理世界，系统性降低市场风险，然后市场机制才能进场并有效运转。

十、 国家治理的物种起源：工程师思维与律师思维

中美治理模式的差异，常被概括为“工程师治国”与“律师治国”，但这不仅仅是政府行为方式的不同，更是两种生存逻辑在治理层面的投影：一边是变革，一边是保守。

1. 两种政治伦理：程序至上 vs 结果交付

西方的治理模式，直接源于英格兰的历史经验。在这个中了自然彩票的“温室花园”里，粮食产出稳定，内部秩序安宁，也没什么外敌入侵。政府既不需要去对抗大自然的暴怒，也不需要去死磕外部的强敌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维护好现有的权利边界，就是最稳妥的活法。

因此，西方发展出了“程序正义”（Procedural Justice）的政治伦理。它的核心就是“保守”：除非是火烧眉毛了，否则在“啥都不做”和“打破规矩”之间，它总是偏爱前者。

基于这种伦理的治理模式，就好比英国人自己调侃的——“且行且看，得过且过”（muddle through）。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混日子方案，因为“世间本无事”，哪怕政府效率低点，社会靠惯性也能转得动。那套像垃圾堆一样杂乱无章、却又备受吹捧的英美普通法系，就是这种低效治理的典型代表。

而美国作为西方当今的代表，把这套模式推向了极端。美国地理条件优越，工业化时间早、成就大；地缘环境安全，周边没有强国威胁，两大洋又隔开了旧大陆的纷争。这种长期的舒适区生存，使其治理模式日益僵化，陷入“只讲程序、不问结果”的空转，最终演变成了过度诉讼化的“律师治国”：精英们沉迷于辩论和博弈，政府被利益集团绑架，偏私、平庸、得过且过，丧失了动员人力物力解决根本问题的能力。

这背后的社会根源在于，美国作为一个“自由国家”，本质上是一个未经充分整合的“马赛克帝国”，由界限分明的各种利益团体拼凑而成。在没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，这种“马赛克”结构自有其活力，但一旦面临严峻挑战，缺乏统一意志的“部落主义”就会暴露无遗，为了

在撕裂中维持共存，“程序”成了最后的共识，而“结果”则被无休止的内斗给牺牲了。这种趋势发展到极致，就是所谓的“否决政治”，它本质上是程序正义对行动能力的瘫痪。这是当今美国治理的顽疾，却也是温室花朵们“死于安乐”的特权。

相比之下，中国面临的是“生存试炼”。在洪水与干旱交替袭来，内乱与入侵如影随形的高风险环境下，无论政府的说辞多么动听，光环多么神圣，如果水旱不绝治不住、百姓流离管不了，那就是治理的失败，“合法性”也就荡然无存。它必须像大禹治水一样，对最终结果负责，交出实实在在的生存与发展成绩单，才有“合法性”可言。

因此，“结果交付”在中国是一种必然的政治伦理，这种政治伦理迫使政府不能满足于做一个被动吹哨的仲裁者，而必须成为一个亲自下场的建设者：这里无可保守，必须变革求存，解决问题的工程师思维必须优先于界定权利的律师思维。

这种治理思维差异，最终具象化为治理人才的差异。当今中国领导层中有很多工程师出身的官员，而美国政治精英则多来自法学院。这可不是巧合，大禹治水的传说，正是中国治理模式的象征性起点：**这位上古圣王本人，就是一位勤于职守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水利工程师**；此后几千年，从都江堰、郑国渠到京杭大运河、黄河治理，直到新中国的水利建设、铁路电网、能源开发，这条脉络从未断绝。

正如鲁迅先生所言：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这种工程师思维，本质上就是这种“埋头苦干”和“拼命硬干”精神的延续。它不迷信口舌之争，只相信实事求是。

2. 百炼成钢：无限责任政府

不同的政治伦理，塑造了不同的政府形态。

有人说中国政府是“中性政府”（不被利益集团绑架），有人说是“贤能政治”（选拔能人干事），还有人说是“有为政府”（主动参与建设发展）。

这一切，归根结底都指向了同一个本质特征——“无限责任政府”。

这与西方那种充当“消极仲裁者”的“有限责任政府”截然不同。西方的政府只需要对法律程序负责，只要程序合规，结果如何往往不在其职责之列。但中国政府必须对最终的生存结果负责：不管过程如何，如果无法保障生存与发展，就是失职，就会丧失合法性。

这种“无限责任”并非源于对权力的贪婪，而是源于巨大的生存压力。

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，普遍面临着严酷的“生存试炼”——农业不稳定、市场风险高、社会易失序。这种压力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具体的威胁：饥荒、动荡、崩溃。在这样的试炼中，政府如果不能成长为一个精于规划、追求效率的“工程师”，去主动改进生产能力、重塑社会秩序，那么它能否持续存在都是个问题。

这种巨大的生存压力，成为约束政府行为的一道无形“纪律”。如果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，资源分配就会失衡，社会矛盾就会激化；如果用人不当、官员无能，政策就会失误，治理就会混乱；如果不积极行动、不投资于长期能力建设，社会就无法应对未来的危机与挑战。其后果轻则动摇统治根基，重则导致政权覆亡。

因此，为了生存，政府必须具备多重特征：

必须“中性”：保持独立性，不被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；
必须“贤能”：只有经过层层历练、证明过自己能力的人才能通过选拔；
必须“有为”：不能坐等条件成熟，必须主动创造条件；
必须“远见”：投资决策不能只看当下的回报，更要关乎未来的基础能力。

这不是道德选择或文化偏好，而是生存压力下的必然进化。

“生于忧患”，试炼的价值正在于此：它没有摧毁这个古老的文明，反而迫使它在极限压力下完成了治理模式的“百炼成钢”。

那些曾经为了对抗洪水、饥荒而进化出来的强大组织能力、动员能力和统筹能力，并没有随着生存红线的解除而失去价值；相反，当中国从“求生存”转向“求发展”时，这套在极限压力下练就的“内功”，立刻转化为了现代化竞争中其他文明难以复制的战略优势。

“那些杀不死我的，终将使我更强大。” 中国政府的“无限责任”，始于生存的无奈，却终将成全发展的自由；它是应对危机的坚固盾牌，更是后来居上的强劲引擎。

3. 苏联悲剧：失去定力的强政府

苏联的案例提供了一面镜子，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模式的独特性。

作为曾经的“老大哥”，苏联的政治结构与中国很像，同样具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，也同样试图通过计划体制改造自然。但结果却令人唏嘘：直到解体，它也没能解决农业困扰。

苏联虽然幅员辽阔，但核心农耕区受制于高纬度，热量不足，生长期短，也深受大陆性气候的旱冻威胁，这种不利条件让粮食产量极不稳定，像坐了过山车一样。以 1980 年代为例，粮食产量在 1.5 亿吨至 2.1 亿吨之间剧烈波动，多次严重歉收。

结果就是，尽管计划体制让苏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卫星能上天，坦克有洪流，但农业这个“生存底座”却始终摇摇欲坠。苏联曾多次发起大规模的垦荒运动，试图通过物理改造来突破农业瓶颈，但受制于高纬度的严酷条件，这些努力往往事倍功半，成效不彰。

更致命的是，与中国不同，苏联在农业建设上长期欠账。粗放的化肥使用、匮乏的农田水利

设施，特别是落后的仓储与运输体系，导致每年的粮食产后损耗率高达 20% 以上。数千万吨粮食并非没种出来，而是烂在了地里或路上。

由于拿不出稳定充裕的粮食作为“货币锚”，苏联只能困守计划体制这个“小市场”，始终无法像中国那样创造出“大市场”，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后劲。

农产品长期短缺，工业品缺乏竞争力，又不愿继续“勒紧裤腰带”的苏联就此走向了高风险的对外依赖：出口石油换取外汇，再用外汇进口粮食。进口量从 1970 年代开始逐年攀升，到 1980 年代，其年均进口粮食高达 3000~4000 万吨。

然而，石油和粮食，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都很不稳定，“石油换粮食”就成为苏联财政的痛脚：1985-1986 年，国际油价暴跌，从每桶 30 美元跳水至 10 美元以下，并在此后的数年间长期低位徘徊。外汇收入骤减，但粮食进口刚需不减，加之军备竞赛和阿富汗战争还在持续开支，财政赤字急剧扩大，外债高筑。这种长期的财政失血，最终引爆了苏联的全面崩溃。

苏联的悲剧表明：“有为政府”是创造奇迹的必要条件，但不是充分条件。

“人定胜天”的前提，既要尊重科学规律与物理极限，不盲动蛮干，也要具备高超的战略定力，坚忍等待有利时机。苏联的失败，不仅在于遭遇了巨大的自然挑战，更在于当农业突围受阻时，它一方面放弃了通过艰苦变革来解决短板的努力，另一方面又缺乏在逆境中“勒紧裤腰带”的坚忍，而是沉溺于大国幻觉，挥霍不可持续的石油红利，去维持与国力脱节的福利建设与军备竞赛。这种“赌国运”式的鲁莽，付出了最为沉重的代价：联盟解体，一夜之间红旗落地，几代人辛勤积累的财富几乎清零。

中国的幸运在于，虽然面临严峻的季风挑战，但胜在农耕区气候温暖；更重要的是，中国展现出了苏联所缺乏的战略定力：始终坚持“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”的立国之本，拒绝陷入对外依赖；始终保持和平发展的清醒头脑，拒绝陷入军备竞赛。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，中国也没有放弃对水利和化肥工业的长期投入，更建立了一套从田间到餐桌的严密粮食调运与储备体系，硬是靠自己解决了吃饭问题。这种“既不受制于人，也不透支未来”的生存智慧，正是中国能够走出试炼、后来居上的关键。

通过一场艰苦卓绝的农业革命，在中国这块“丰饶但危险”的土地上，粮食稳产高产的问题最终解决了。而苏联则受制于自然约束和战略短视，最终未能解决农业困境，跨过“有效市场”的门槛。今天的俄罗斯在气候变暖和技术进步的帮助下，农业状况已经大为改善，只是对于苏联来说，这一切来得太晚了。

十一、打破迷思：文明不必冲突

中国崛起的意义，不仅在于给南方国家打了个样，更在于它重塑了世界格局。

冷战结束后，没了苏联这个对手，西方学者塞缪尔·亨廷顿搞出了个“文明冲突论”，悲观地预言：后冷战的世界冲突不是因为主义不同，而是因为文化不同。文化差异将导致文明间

的对抗不可调和。

然而，中国崛起改变了一切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早在 1994 年就说过：“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。”在这个巨大的变量面前，曾经风靡一时的“文明冲突论”过时了。

这个理论最大的盲区在于：它试图用文化差异来解释世界，却忘了人类历史的真正原动力：**对生存与发展的永恒追求。**

1. 告别生存焦虑：现代国家的和平基石

翻开历史，你会发现，意识形态也好，文化身份也罢，从来都不是人类生存的目的，而是工具。古代那些文明冲突，不管是十字军东征还是蒙古铁骑西征，根子上都是为了抢饭碗——争夺土地、水源和贸易通道。正是因为饭碗端不牢，“无恒产者无恒心”，大家才热衷于去抢别人的来补自己的。

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彻底变了。

二战以后，工业化和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，让世界主要文明区域的粮食产量和稳定性都有了质的飞跃。化肥、农药、良种、灌溉——这套组合拳让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粮食危机走向尾声。从欧洲到东亚，大家基本上都实现了“吃饭自由”，建立起了基于粮食安全的和平秩序。

今天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玩家，本质上都是同质化的现代国家。 尽管大家文化传统不一样，但只要完成了现代化转型，社会秩序的基石就不再是宗教信条或宗法血缘，而是稳定的粮食产出、发达的工业体系。亨廷顿把大家按文明画圈圈，其实是掩盖了各国在本质上的相似性——大家都是建立在和平秩序之上的现代国家。

当然，这不代表现在天下太平了。西亚北非、撒哈拉以南非洲还在乱，但这并不是因为什么“文明冲突”，而是因为发展不平衡：他们的粮食危机还没解决，社会转型还没完成。

另外，能源价格波动也让资源型国家难以稳定、缺少资源的国家发展受阻。但能源风险和粮食风险有着本质区别。粮食风险是可能要命的，那是生存危机；能源风险只是影响赚钱，那是发展危机。随着大国不再面临大规模饥荒的死亡威胁，今天它们之间的分歧再大，也远远没到要像两次世界大战那样拼个你死我活的程度。

因此，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，并不存在非打不可的理由。如果非要在历史中找个参照物，那既不是雅典和斯巴达的生死决斗，也不是一战前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剑拔弩张，而是美国与英国之间和平完成的权力转移——那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在两个真正“现代”国家之间的竞争。

2. 告别殖民掠夺：中国崛起的独特性

中国崛起和其他大国不一样：中国没有殖民掠夺的冲动。这不是道德说教，而是历史基因与现实利益共同塑造的必然。

历史上，中国很早就算明白了一本账。自秦汉以来，农耕核心区就定型了，去统治北边的草原、西边的高原或者南边的丛林，那是赔本买卖：收益还不够支付驻军和治理的成本。对于当年靠天吃饭的中国文明来说，核心任务永远是“向内求索”——治理季风带来的旱涝灾害，维持广袤国土的和平，远比向外扩张重要。

所以，中国发明了“朝贡体系”。这套国际关系安排常被污名化，但它其实是一种成本最低、收益最稳的东亚秩序维护方案：中国向朝贡国回赠丰厚的礼物，赋予贸易特权，换取朝贡国家承认中国的地位，大家各取所需，共享和平。这和西方殖民体系是两码事。殖民体系的逻辑是武力征服和经济掠夺。而朝贡体系的逻辑是和平交往和贸易互惠。郑和下西洋，带去的是货物和友谊，而不是殖民据点。这绝不是偶然，而是中国文明内在的处世逻辑。

回到现实中，对中国而言，殖民掠夺不仅是道义污点，也极其短视。它只会把南方国家推向对立面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有能力选择另一条更道德也更有利的道路：做大蛋糕。通过帮助南方国家建设基础设施、发展贸易往来，让南方国家从“穷朋友”变成了繁荣的市场，中国作为建设者和贸易伙伴，自然能够获得比殖民掠夺更高、更安全的收益。

历史基因加上现实利益，决定了中国和南方国家关系的独特属性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就是这种新型关系的样板。它就好比当年的马歇尔计划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“一带一路”不是为了建立排他的势力范围，而是为了修路架桥搞互联互通。当中国帮非洲修铁路、帮东南亚建工厂、帮中亚搞能源时，这不是在做慈善撒钱，而是在投资未来。这些投资不仅帮当地跨过了发展的门槛，也为中国自己的产能和技术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。这不是只有一方受益的施舍，而是互利共赢的理性选择。

十二、 领袖之道：走出宿命的建设者联盟

把东西方的发展故事讲到这里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核心问题了：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谁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领袖？

真正的领袖，不能只懂得在风平浪静的温室中种花养草，更必须懂得如何在狂风暴雨的试炼中绝地求生。

1. 南方国家的真实困境

我们必须说句公道话：大多数南方国家发展不起来，不是因为他们懒，也不是因为压力小、日子好过。恰恰相反，他们面临的困难往往比中国还要大，甚至大到了超出了他们能力的极限。

西亚北非：这里是典型的“有土无水”。虽然光照充足，但降雨稀少且蒸发剧烈，农业天然受限。在人口激增的现代，这已经不是修几个水库就能解决的问题，而是水资源总量的绝对匮乏。

撒哈拉以南非洲：这里面临的是多重地理诅咒。热带病虫害严重削弱了劳动力，雨林和草原的气候让农业发展的门槛很高，再加上缺乏天然良港，内陆运输成本高得惊人。

印度：作为南方国家的典型，印度的农业条件其实远不如中国。它的降雨极度依赖南亚季风，而南亚季风登陆时间、降水强度和持续时长都高度不确定，年际变化剧烈，加上高温高湿导致的病虫害，让印度的粮食产出不仅低，而且极不稳定。

2. 印度的困局：难以跨越的生存试炼

印度不仅面临着比中国更严峻的自然挑战，还面临着更深层的国家能力困境。

恶劣的农业条件，从根子上制约了印度的国家能力。农业灾害频发、产量剧烈波动，意味着国家收不上来稳定、充裕的税收。税收不足，就养不起足够的官僚和军队，也就无法建立真正稳固的统一。这导致印度在几千年的历史上，统一是短暂的偶然，分裂才是漫长的常态。

因此，印度历史上就缺乏“有为政府”的传统，现实中也未能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来重塑基层结构。

当然，这并没有完全挡住印度的发展。靠着有限的农业改良，它依然在缓慢前行。但这种前行始终背着沉重的枷锁：

印度缺乏强大的国家能力来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，而移植来的“西方式选举”在这个缺乏整合的社会土壤上也变味了——民主没有带来高效的治理，反而变成了短视的政治内斗，加剧了种姓和宗教的撕裂，进一步伤害了印度的国家能力。

它并没有“停滞”，但只能在不断的妥协和内耗中，艰难爬坡。

3. 西方的傲慢与中国的共情

对于深陷“生存试炼”的南方国家，西方很难理解，更谈不上同情。它们习惯了那种“撒下种子就有收获”的幸运，便想当然地认为：只要照搬西方的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，繁荣就会自动到来。

它们只会指责南方国家不够民主、政府管得太多、市场不够开放，甚至在危机时刻落井下石，掠夺这些国家。这不仅是无知，更是伪善。

而中国之所以能赢得南方国家的广泛信任，是因为浴火重生的中国懂得共情，更懂得“建设改变命运”：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，如果不通过“有为政府”去组织建设、改造环境，那就只能听天由命。

因此，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关系，呈现出一种西方无法复制的特质——基于深层理解的尊重与互助：

- **平等与尊重：**中国深知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艰难，所以愿意以平等、尊重之心对待每一个南方国家。
- **不搞虚伪的说教：**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不强推意识形态，不附带政治条件。
- **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：**‘一带一路’不仅修路架桥，更提供农业和新能源技术的支持。从解决吃饭问题的杂交水稻，到解决用电问题的光伏风电，中国致力于帮助南方国家夯实生存底座。。

这是一种基于理性的互利共赢。中国帮助南方国家，不是为了建立某种依附体系，而是因为中国清醒地看到：只有让更多的国家走出生存试炼，创造有效市场，世界市场才会真正扩大，人类文明才能真正走出匮乏的泥沼。

这不只是生意，更是“走出宿命的建设者联盟”。

十三、 伟大的博弈：霸权的消解与秩序的重生

审视当下的中美博弈，我们必须跳出简单的“修昔底德陷阱”——那不过是两个国家在旧体系里抢椅子的老故事。中国所代表的力量，并不是要在这个旧体系里替代美国当新霸主，而是要从根本上消解这种基于暴力和等级的霸权体系。

1. 离岸制衡：鲜血供养的“自由”

“一招鲜，吃遍天。”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帝国，盎格鲁-撒克逊霸权之所以能够延续几百年，核心策略就是一招：“离岸制衡”。

这一招的本质，就是英美国利用自身作为岛国或超级岛国的地理地缘优势，在安全的位置上，利用甚至挑动大陆强国之间的对抗。它们的安全感，始终建立在大陆国家的互相残杀之上：从组织反法同盟围剿拿破仑，到介入两次世界大战，再到今天的俄乌战争，这一逻辑从未改变。

这一招之所以能长期成功，一是得益于欧洲大陆长期的分裂；二是得益于英美作为先发国家拥有的实力优势，使它们在各国对抗中有了“一锤定音”的分量。

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曾赤裸裸地说过：“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，也没有永恒的敌人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” 二战期间，当时还是参议员，后来当了总统的杜鲁门说得更直白：“如果我们看到德国赢了，就帮俄国；如果俄国赢了，就帮德国，让他们尽可能地互相杀戮。”

这些名言揭示了霸权的冷酷真相：离岸者的霸权，是建立在在岸者的互相残杀之上的。

因此，英美霸权下的所谓“自由秩序”，代价极高——它意味着旧大陆必须长期处于流血和动荡之中。一战和二战，其实是这种玩火策略的终极恶果：英国为了阻止欧洲大陆的自然整合，不惜将局部冲突放大为世界大战；为了消耗大陆强国，结果养出了失控的纳粹德国，最后差点把自己也搭进去。

美国并不是这一逻辑的无辜旁观者，而是忠实的继承者。二战后，无论是策动两伊战争让中东强国互相毁灭，还是在欧洲操弄俄乌冲突制造地缘裂痕，本质上都是为了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任何统一的力量。

此外，霸权的持续还依赖于一个沉默的背景：广大南方国家的贫弱。因为缺少足够的工业化力量，它们面对这种不平等秩序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充当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产地，被动接受安排。

2. 告别丛林法则：走出恐惧的囚笼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霸权争夺被视为国际体系内的必然现象。

在一个资源相对稀缺、发展严重不均衡、力量对比起伏不定的世界里，各个国家必然互相猜忌，缺乏安全感。如果不成为霸权国，就随时可能被欺压，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言：“不在餐桌上，就在菜单上”。在这样的丛林法则下，理性的国家策略必然是争霸。正如一位学者所断言的：“大国就是要做街上最横行霸道的那个恶棍。”

然而，中国的崛起正在打破这重囚笼。

这首先是因为力量对比的根本性逆转。与历史上破碎的欧洲或中东不同，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千年大一统传统的超大规模单一政治实体，内部高度整合，没有裂痕可供操弄；而从外部看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实力去充当美国制衡中国的‘马前卒’。

这种内无裂痕、外无强敌的格局，使得美国面临着严重的战略被动——它失去了“四两拨千斤”的从容，陷入“千斤拨四两”的窘迫。当天平的一端站着一个巨人，而另一端找不到足够重的砝码时，离岸平衡术就彻底失效了。

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足够的战略空间，无需被迫卷入霸权争夺的零和博弈。

更重要的是，工业与科技力量的进步，特别是新能源革命的突破，正在从物理底层瓦解霸权体系的根基。

核能、光伏、风电、储能、电动汽车——中国在这些决定未来的关键领域已占据主导地位。这标志着能源获取逻辑的根本转变：从依赖地理禀赋的“开采模式”（家里有矿），转变为依赖工业能力的“制造模式”（技术创新）。

无论是光伏、风电的设备制造，还是先进核能技术的突破——将铀资源利用率提升数十倍并“变废为宝”，或者利用储量更为丰富的钍资源，乃至未来视海水为燃料库的核聚变——本质上都是将能源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。只要掌握了这些技术，每一寸荒原甚至海水都能成为能量来源。

这一变革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是颠覆性的：

一直以来，化石能源分布不均且依赖漫长的海运，使得控制“咽喉要道”（如马六甲、霍尔木兹）成为霸权国扼杀对手的致命武器。但是，当能源从一种必须争夺的“地理资源”变成了一种随处可得的“制造技术”，旨在封锁航道和产地的海上霸权，终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。

这不仅为中国摆脱能源安全紧箍咒提供了终极方案，更为人类社会带来一道曙光——从根源上铲除能源争夺所导致的战争。

当能源不再是零和博弈的标的，而是人人可得的技术，国际关系就具备了从基于恐惧的“丛林法则”向着基于合作的“互惠秩序”转变的物质基础。

3. 建设新世界，消解旧世界

基于这种物理逻辑的剧变，中国并不需要与美国争夺霸权。

霸权国对中国进行围堵，恰如寓言中守着“死老鼠”猫头鹰，对飞过天空的凤凰发出恐吓：它根本无法理解，对方的志向早已不是这腐臭之物。

争夺霸权，就意味着去抢那只“死老鼠”，意味着承认旧秩序的合理性，意味着继续在丛林法则中厮杀；中国不屑于此，而是志在消解霸权：通过建设互惠秩序的新世界，让霸权赖以生存的土壤自行瓦解。**这不仅是道义的选择，更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。**

其实，霸权的成本极高。正是因为和平与繁荣的缺位，才使得霸权成为可能。而作为霸权国，为了维持这个等级森严的秩序，必须维持庞大的驻军和干涉体系，介入无休止的地区冲突。

为了弥补这些高昂的霸权开支，霸权国就必然要压迫和掠夺那些本来就缺少和平与繁荣的国家。这种“收保护费”的模式，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收益，但却会带来长远的战略损害和无法洗刷的道义污点。这种饮鸩止渴的循环，正是霸权走向自我毁灭的根源。

承接霸权意味着背负旧世界的沉重包袱，相比之下，**消解霸权体系则是收益最大化的策略**，意味着轻装上阵，以最小的战略成本，换取最大的发展空间。凭借急速增长的经济、科技和军事力量，中国有能力做出这一新选择。

扶持南方国家，这是对霸权体系的釜底抽薪。 中国通过输出建设能力，帮助亚非拉国家实现工业化。一个经济富裕、国力增长的全球南方，将自动脱离霸权国的控制，从根本上消解霸权体系。

交往发达国家，这是对霸权体系的分化瓦解。 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全产业链优势，构成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而霸权国为了自救而发起的无差别收割，正迫使盟友离心离德。这种“利益引力”与“收割恐惧”的合力，正在从内部瓦解霸权国的联盟体系。

面对霸权国本身，中国奉行“上兵伐谋”。 从实力地位出发，中国选择“鱼与熊掌”兼得：以武力震慑霸权国，保护自由贸易；以互利消解对抗，拒绝武力压迫。“善战者无赫赫之功”，这不仅是让中国获得尊荣的坦途，更是让旧霸主回归正常国家的救赎之路。

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界，将会自动消解一个霸权体系的旧世界。 这就是天命所归的终极逻辑。

十四、 结语：其命维新

当博弈的尘埃落定，我们终将发现，这不仅是一场权力的转移，更是一次文明的重生。

曾几何时，“历史终结论”傲慢地宣称西方制度是人类的最终形式。然而，中国崛起打破了这一迷思。它向世界证明：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，西方模式并非普世的终点，历史不仅没有终结，反而在东方的土地上开启了新的篇章。

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 这出自《诗经》的古老诗句，在今天焕发了全新的含义：它不仅意味着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，更预示着人类历史正在经历一场从“丛林法则”向“天下为公”的根本转折。

中国的维新

中国的现代化，不是在“美国神学”的框架内寻找自己的位置，而是基于“大禹治水”的文明基因与“逆天改命”的奋斗精神，走出的一条建设者之路。

中国没有通过战争去掠夺别人，而是向内挖掘，通过艰苦卓绝的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，在不利的条件下打破了贫穷的宿命，创造了发展的奇迹。

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通过组织起来、征服物理世界从而掌握自己命运的故事。

这是“变革逻辑”对“保守逻辑”的胜利。

世界的维新

放眼世界，人类文明也到了“维新”的时刻。

数千年来，人类文明被锁死在“马尔萨斯陷阱”和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的双重宿命之中。因为生存资源有限且不稳，文明交往受困于零和博弈；因为安全感匮乏，霸权与掠夺成为了国际关系的底层逻辑。这种宿命曾被视为永恒，正如历史学家所叹息的：“未来和过去的相似，就像两滴水一样。”

中国道路的出现，正在打破这重枷锁。

现代农业革命正在解决粮食危机，新能源革命正在解决能源危机，中国引领的建设能力正在向全球扩散。当生存底座被夯实，当发展权利被普惠，人类文明第一次有机会走出“资源匮乏导致的永恒战争”，迈向“以建设替代掠夺”的新纪元。“属于‘空谈者’的时代正在落幕，属于‘建设者’的时代正在开启。未来的世界秩序，将不再是基于霸权等级的“治人”，而是基于共同发展的“治水”。

维新的真义

人类这个古老的物种，在克服生存焦虑的进程中，正在走出分流的宿命，迈向合流的未来。这不是简单的“回归”，而是“维新”——不是回到某个想象中的黄金时代，而是开创一个全新的纪元。

《圣经·创世记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上帝和人角力，都得胜了。”

中国与逆境角力而胜之，人类与命运角力而胜之——这就是“其命维新”的真义所在。

大禹归来，天下安澜。百川归海，万邦协和。

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